



编者按 谢希德先生(1921.3.19—2000.3.4)是著名物理学家、教育学家,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的开创者及奠基人,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、物理学科教研机构的建立与发展、科教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,以及中国物理学会的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。谢先生高尚的师德师风深受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敬重,她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,永远值得我们心怀敬佩。2021年是谢希德先生诞辰100周年,本刊特以专题,寄托我们的怀念与敬仰!专题文章前三篇为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今年3月编撰的《谢希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约稿而作。

温馨的回忆

甘子钊[†]

(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100871)

谢先生离开我们21年了,今年是谢先生百岁生日,每当想起她时,心里的感觉就是满满的温馨。

她首先是一位深切关怀 学生和同事的好教师

我大学本科不是半导体专业的,谢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我没听过她的课,也没有过任何交往;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当黄昆先生的研究生



谢先生和学生们亲切交谈

时,才开始与谢先生认识交往。我那时患较重的强直性脊柱炎,朋友们根据我的体型,给我一个形象的绰号“ β ”;每次谢先生来北大见到时,都会小声地问我:“你的 β 怎样啦?不要大意啊!”有时还会告诉我一些她听到的治疗方子。那时黄先生的教学秘书韩汝琦同志,患有较重的哮喘病,谢先生一见到他也总要问他的病情,劝他要想办法根治,不能老用喷雾器。让我俩都有一种见到家里长辈的感觉。到八十年代,我和谢先生见面的机会比以前多了。谢先生那时已经是非常非常忙的一个领导干部了,我也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,但是她也总是关心我的 β ,见面总不时的提醒,要我不要大意,要注意维持体型;还是像一个长辈对子弟似的对我关怀备至。

八十年代李政道先生搞了个CUSPEA计划,通过公派方式出去了几百个留学生。我当时也常常帮着李先生处理一些有关的事务。但是谢先生是最最关心这些学生的人。每次聊起这些人时,她对许多出国留学的学生具体情况,特别是那些做出较好成果同学的具体情况,包括姓名、学业、生活、身体,甚至有没有异性朋友,比我都了解得具体多了。说起来如数家珍,其中多数人也不是复旦大学出去的。常常使我感到她真像个家族中的老祖母似的,和当

2021-03-18收到

[†] email: zizhaogan@pku.edu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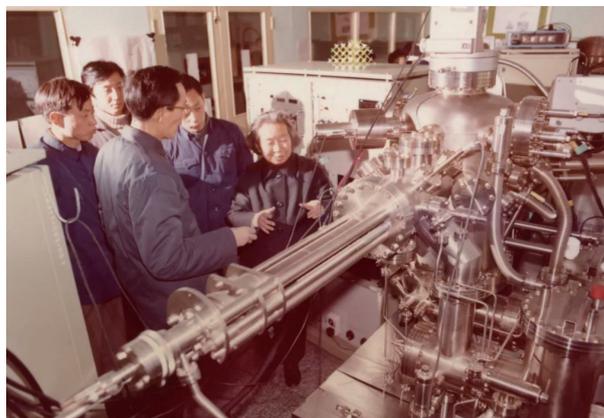
DOI: 10.7693/wl20210402

时她是一个中国最大城市的主要党政领导之一的职位显得不大协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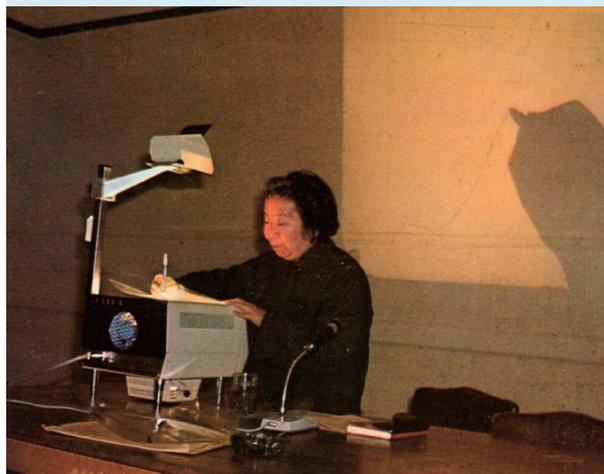
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和谢先生聊起平时她很不愿意谈论的问题：“文革”中她受到冤屈的荒唐往事时，她痛苦地说：“唉！也怪我没有老曹（指曹天钦院士，谢先生的爱人）的坚强，那时老曹和我都被隔离了，看管我的人又告诉我家里的保姆也被赶回乡了，我就想我儿子，十二三岁的孩子，他吃什么？怎样过活？我就闭眼认了，以为表现好能放出去照顾儿子……没想到反而是我更不能‘解放’，拖了好久好久，受了更多的罪；一个女人，一个母亲真难啊！”和她聊完后我想了很久，也想过多次，我觉得我逐渐理解了：谢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；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，而且相当“世事洞明，人情练达”的学者，还是一位优秀的党的干部；但是从实质上说，她更是一位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妇女，一位好妻子，好母亲，她把一个好母亲的温情给了家人，也给了她的学生和同事。所以，不管她正在做什么，还是曾经做过什么，她总首先是一位好教师，一位既诲人不倦又全面关怀的教师。

画鬼容易画人难

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，正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建立的时期，我那时正在黄昆先生处做研究生。像当时许多学物理的青年人一样，总觉得粒子物理是物理的“正统”，我就常常在下面阅读场论和粒子物理的文献。细心的谢先生注意到这点，有一次她在闲谈中和我说，粒子物理现在有很大发展，但是固体物理也要发展，固体物理有时比粒子物理更难呢！她说，固体物理有许许多多实验事实，有许许多多可以做的实验，比高能物理的实验积累多多啦！这些细节要解释可很难，“画鬼容易画人难”啊！我知道谢先生在四十年代后期就师从Slater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固体能带计算，她是深刻体会Slater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坚持对原子、分子、固体做量子力学计算的“初心”的。我那时就理解她对我的教导的良苦用心。



80年代，谢先生在表面物理实验室



1978年复旦大学副校长谢希德教授作表面物理学术报告

八十年代初，谢先生用很大的精力，推动我国表面物理的研究。我多次看到她在从事种种活动时，书包里装着表面物理的文献复印本，活动中有空隙时就拿出来阅读；也多次听到她对我解释一些新的表面物理实验手段、仪器和计算方法。我心里想：她正在“画人”呢！作为一位固体物理学家，谢先生非常深刻地理解，从量子力学的理论和图像来认识固体物理现象的基础性、重要性和迫切性。她全力地推动固体物理新的计算方法和新的实验手段就是她的初心。老一辈学者就是这样对待“学科”的！

科学属于全人类，
科学家有祖国

我随从谢先生参加过两届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；陪同谢先生参加过很多次和美籍华裔学

者、港澳台学者的活动。谢先生对这些活动是非常用心用力的，事先她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，活动中她是最费力气的，常常累得精疲力尽。她和许多外国朋友、华裔朋友、港澳台朋友都有着很深的友谊。她尽力为他们办各种事务，不避烦琐，而且十分细致周到；其中有不少朋友，不论是年龄层次或学术辈份都比她低得多。让当事人和我们这些旁观者都很感动。

记得有一次我向谢先生汇报，在美国一次会上，前苏联的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崇敬。那位学者在会上很霸气地说：“以前在俄国时，我总觉得你们美国人，用很多钱去做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事。这次我为了挣点钱来你们这里打工，更加强了这种感觉。”与会者对他的说法，却报以热烈的掌声。谢先生听后，有点悻

然地对我说：“唉！他(指那位俄国学者)是‘有货’啊！我们现在还是需要他们(指美国科学界)的帮助，要向他们学。我这代人做不到，看来你们这代也可能做不到，可下一代一定会做到：科学上比俄国强！也会比美国强！会受到他们更多的尊重的。”谢先生的这次谈话让我想了很久，为了祖国，她心里有“苦”啊！对谢先生这样老一辈子学者来说，热爱科学和热爱祖国是没有矛盾的，因为在她来说，对“科学”和“祖国”是“热爱”，是“责任”，是“献身”，可就是“无我”。

日子过得太快了，我现在比谢先生过世时的年龄还多两年啦！作为她的学生和忘年朋友，在回忆她时，除了感到满满的温馨外，就是想说，她的一生也够“苦”够“难”的，可是过得值得，过得美好！

谢希德先生与中国物理学会

杨国桢[†]

(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190)

谢希德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女科学家。她不仅学问好，在与国际科学界的友好往来中，也彰显出独特的智慧与个人魅力。谢希德先生不仅是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、杰出的教育家，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物理学会发展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理事长。她从1963年起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，1978年至1991年担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。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的秘书长，与谢先生有过较多的接触。她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巾帼英雄。

谢先生十分重视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。1974年由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主办的《物理学报》复刊，谢希德先生担任副主编，与主编王竹溪、副主编管惟炎和李荫远

先生一起为学术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。谢先生先后在《物理学报》发表了《隧道二极管伏安特性的温度关系》、《能带理论的进展》、《稀土元素在硅表面的化学吸附》等8篇论文，身体力行地为《物理学报》的发展做出了切实的贡献。



中国物理学会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(1987年2月，北京)。自左至右：钱三强、周培源、谢希德、黄昆

2021-03-18收到

[†] email: yanggz@iphy.ac.cn

DOI: 10.7693/wl20210403